

埃及妇女非政府组织刍议

邢桂敏

内容提要 自 19 世纪女性主义意识产生以来，埃及女性主义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围绕各个时期不同的奋斗主题，埃及女性主义者成立了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埃及妇女非政府组织呈现下列几个特征：非独立性、严格的等级制组织与结构松散的组织并存，以及阶级性。埃及妇女非政府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受性别歧视、传统文化因素、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另外，官方对“经济活动”的定义也影响了妇女价值的实现。

关键词 埃及 妇女非政府组织 女性主义

作者简介 邢桂敏，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西安 710069）。

在西方人看来，中东妇女是沉默者或传统习俗的受害者，无力建立自己的组织，^① 这种看法显然带有偏见。大量历史资料表明，中东妇女在 19 世纪就已建立自己的组织，尤其在中东女性主义走向成熟以后，妇女非政府组织走出了以往局限于慈善或社会福利等传统的活动范围，成为改善妇女状况、代表女性呼声的重要社会力量。在世界性现代化潮流冲击下，中东地区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传统的政治、历史、文化因素仍制约着现代力量的成长，因此，中东妇女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呈现出自身的独特性。埃及是中东地区现代化启动较早的国家，埃及女性主义的发展也走在其他中东国家前列，成为其他国家女性主义发展的楷模。所以，研究埃及妇女非政府组织对于了解整个中东地区妇女非政府组织及女性主义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妇女非政府组织 与埃及女性主义

从 19 世纪末埃及女性主义意识产生到穆巴拉克执政时期，埃及女性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逐渐由自发走向自觉，由公共的社会福利活动转向多种形式的政治参与，从反

帝国主义者、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转向女性主义者。^② 其奋斗目标也不断调整，围绕各个时期不同的奋斗主题，创立了各种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妇女非政府组织是埃及女性主义发展的具体体现，从它的人员构成、组织结构到活动方式都反映了女性主义的诉求和发展方向。早在 1914 年，胡达（Huda）和一些早期女性主义者在王室公主资助下成立了“埃及女知识分子协会”，希望通过正确解释伊斯兰教，使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获得基本权利，^③ 但影响不大。埃及民族主义思潮及运动为埃及女性主义成长提供了平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中东各地民族情感转化成民族解放运动的分水岭，它引发了中东大规模民族解放运动。埃及在华夫脱党领导下掀起反英独立运动，得到知识分子、教师、学生、农民和妇女的支持。1919 年妇女参加民族反英起义被

① See Dawn Chatty and Annika Rabo, *Organizing Women: Formal and Informal Women's Groups in the Middle East*, Oxford International Publisher Ltd, 1997, p. 1.

② See Nadje Al - Ali , *Secularism, Gender and State in the Middle East: the Egyptian Women's move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26.

③ See Bahira Sherif - Frash, *the Greenwood Encyclopedia of women's issues: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Greenwood Press, 2003, p. 90.

看做埃及女性主义走向公开化的转折点,之后,华夫脱党成立了妇女分支机构。埃及妇女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得到锻炼,培养了独立的思考和组织能力,对妇女地位问题有了更深的认知。1923年,胡达成立了“埃及女性主义联合会”(Egyptian Feminist Union, EFU),其奋斗目标是争取妇女教育权、变革私人法,促进社会福利,实现两性平等。^①同年,埃及新宪法没有赋予妇女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只是把妇女的结婚年龄提高到16岁,也没有赋予妇女选举权和离婚权。^②于是,“埃及女性主义联合会”又把争取选举权列为奋斗目标之一。1924年,第一次议会后,埃及女性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分道扬镳,第一代女性主义者争取妇女选举权的目标没有实现。后来由于思维方式和斗争策略的分歧,“埃及女性主义联合会”无法满足所有女性主义者的要求,1936年该组织内部发生分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社会和政治环境都发生变化,妇女非政府组织也有了新发展。

从1945年胡达的杂志《埃及妇女》(Al-misriyyah)关闭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德瑞亚·莎菲克(Doria Shafik)的“尼罗河女儿联合会”(Daughter of the Nile Union)代表着埃及女性主义的新发展。该组织于1948年成立,其奋斗目标是全面争取妇女的政治权利,要求改善穷人的文化、健康和社会服务条件,并把妇女的政治权利斗争与社会改革结合起来。^③与“埃及女性主义联合会”相比,“尼罗河女儿联合会”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它不与任何政党有瓜葛,也不接受政府领导,在斗争方式上也更激进。它通过示威、绝食和演说等方式,要求政府给予妇女选举权。德瑞亚·莎菲克与纳赛尔的最直接冲突、也是最后一次冲突发生在1957年,她在印度大使馆绝食,抨击埃及的集权统治。德瑞亚·莎菲克的悲剧在于她走向了纳赛尔的对立面,违背了纳赛尔的“国家女性主义”政策,“尼罗河女儿联合会”遭取缔,德瑞亚·莎菲克被软禁(后在尼赫鲁的干预下获释)。囿于该组织的斗争策略(阶级对立),以及纳赛尔的“国家女性主义”政策阻碍了埃及独立女性主义力量的发展,限制了妇女非政府组织的活动。

埃及独立女性主义力量的重现是在20世纪

70年代,更确切地说是到了80年代以后,因为萨达特的自由、民主和开放的国策虽然不反对妇女解放,但也没有为女性主义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萨达特推行的经济开放政策,在提倡机会均等的同时,致使全国失业率高涨,女性受害尤甚。找工作的男性越多,使妇女的失业率越高;大量男劳动力外出打工,女性负担加重。^④经济问题成为人们关心的首要问题。萨达特在政治上推行多党制,倡导民主、自由。很多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获释,取缔多年的会刊《号召》(the Call)^⑤重新出版,结果使一度沉寂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迅速膨胀,要求“妇女回家”的呼声日渐高涨。因此,这一时期埃及独立的女性主义力量没有成长起来,妇女非政府组织也尚处于酝酿之中。

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埃及妇女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1982年,纳瓦尔成立的“阿拉伯妇女团结协会”是自50年代中期以来埃及第一批独立的妇女非政府组织之一。^⑥80年代中期,埃及妇女非政府组织开始打破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把所谓的私人问题或家庭问题带入公共领域,当做政治问题讨论。^⑦引领这一女性主义发展新趋势的就是纳瓦尔,她把堕胎等一些社会禁忌问题在社会上公开讨论,在女性主义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及政府内引起极大的反响。

这一时期的埃及女性主义呈现多元化趋势,不仅有新生代和老一代女性主义者间的分层,就在新一代女性主义内部,因个人的经历和动机不

① See Kumari Jayawardena, *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Third World*, Zed Books Ltd, 1986, p. 54.

② Ibid.

③ See Nadjie Al-Ali, op. cit., p. 64.

④ See Dawn Chatty and Annika Rabo, op. cit., p. 197.

⑤ 该刊曾于1954~1976年间停刊。

⑥ 尼古拉·普拉特(Nicola Pratt)在《埃及的霸权与反霸权:倡导非政府组织、市民社会与国家》(“Hegemony and Counter-hegemony in Egypt: Advocacy NGOs,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一文中认为,是自1952年以来第一批独立的妇女非政府组织之一,而忽视了德瑞亚·莎菲克领导的“尼罗河女儿联合会”。

⑦ See Nicola Pratt, “Hegemony and Counter-hegemony in Egypt: Advocacy NGOs,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in Sarah Ben Nefissa and Sari Hanafi,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Situating Arab NGOs*,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00, p. 141.

同,各非政府妇女组织在性质和目标等方面也有很大区别。有的是提倡妇女权利的组织(如阿拉伯妇女团结协会),有的是非政治性的服务组织(妇女发展和提高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Enhancement of Women”),有的从事妇女问题的研究(如“新妇女研究中心”),有的是职业性的妇女组织(如“埃及妇女作家协会”),还有一些在国际组织的援助下从事福利活动,也有一些是针对具体问题临时成立(如“妇女媒体观察”,“Women's Media Watch”)。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分析和解决埃及妇女问题。她们出版研究型的期刊杂志,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研讨会,或直接提供经济贷款、参加国际性的女性会议,等等,形成了多种形式的埃及女性主义运动。新妇女研究中心曾围绕“妇女、法律和发展”问题多次组织不同规模的研讨会。20世纪90年代后,女性主义者和埃及政府都已无法忽视国际因素和国内伊斯兰势力的影响,穆巴拉克对妇女问题采取实用态度。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压力下,穆巴拉克不仅减少对妇女政治参与的支持,还把女性主义同伊斯兰军事组织和共产党一样作为打击目标。90年代初,迫于宗教压力,他取缔了纳瓦尔领导的“阿拉伯妇女团结协会”(AWSA)。为了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在筹备1994年和1995年的两次国际性会议期间,埃及非政府组织经历了短暂的发展时期,政府批准成立了一批非政府组织,其中包括“妇女媒体观察”。

妇女非政府组织的特点

(一) 埃及妇女非政府组织的非独立性

非政府组织不是总像其名称所显示的那样具有严格的“非政府性”^①。实际上,很多中东国家独立后都对非政府组织作了不同程度的限制,伊朗、埃及、约旦等国的非政府组织都要经过官方注册,因此,有学者把这样的组织叫官方非政府组织(GNGOs)^②。非政府组织作为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要素,其显著特征之一是相对独立性。埃及非政府组织分为两种:一种是遵守结社法,并在社会事务部注册,这样的组织一般注册为私人志愿协会(PVOs);另一种是为了免受国

家完全控制,注册为研究中心或非营利公司(如“新妇女研究中心”和“一起”),或根本不经合法注册^③。还有一些妇女非政府组织为了避免国家控制就不独立注册,而是成为一个地位稳固的老组织的一个下设机构,比如阿拉伯律师联合会下属的妇女委员会就属于这种性质。尽管妇女非政府组织竭力摆脱国家的控制和监督,但政府也会以各种手段通过社会事务部或国家妇女组织干预妇女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包括宣布它们为非法组织,严格限制各组织的资金运转情况及其来源,尤其是外来资金。1991年,穆巴拉克就以滥用资金为由,通过社会事务部取缔了阿拉伯妇女团结协会。此外,埃及政府还以正式法律条文形式限制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及发展。1964年的法律第三十二条限制志愿性组织(社会发展协会、农村协会、教育和医疗慈善活动、体育和艺术及音乐协会、妇女协会)的建立及其活动范围、成员人数、特定地区的组织数量;该法律第三十二条还规定,政府有权推翻各组织领导委员会的决定,甚至解散委员会,禁止从事任何政治或宗教活动,^④此外,该法律第三十二条还给予政府监督各非政府组织的资金往来的权力。

(二) 严格的等级制组织与结构松散的组织并存

虽然女性主义者大多反对传统的官僚化、等级制组织结构,但在中东大多数国家,只有很小比例的市民社会触及权威主义和等级制组织模式。^⑤多数非政府组织都遵循一条明确的领导模式,即由领导者控制决策程序,志愿者或普通成员对组织决策几乎没什么影响。即使是组织结构松散的组织也明显带有传统等级制的痕迹,某些人员常居领导职位。大多数妇女非政府组织也遵循这种组织模式,敢于挑战现行政治文化、推进民主化进程的妇女越来越少,^⑥她们有的是政府

① Jude Howal and Diane Mulligan, *Gender and Civil Society*, Routledge, 2005, p. 106.

② See *ibid.*

③ See Azza M. Karam, *Women, Islamisms and the State: Contemporary Feminisms in Egypt*, Martin's Press, 1998, pp. 121 - 122.

④ See Dawn Chatty and Annika Rabo, *op. cit.*, p. 150.

⑤ See Jude Howal and Diane Mulligan, *op. cit.*, p. 110.

⑥ *Ibid.*

人员,有的是伊斯兰运动成员,还有的是市民社会成员,都服从于传统的政治模式和社会分工。

妇女非政府组织是一个国家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产物。深厚的权威主义传统和等级制结构,使埃及妇女非政府组织很难摆脱传统组织模式,即使有少数埃及妇女非政府组织在寻求新的、恰当的组织方式,但由于现有民主政治结构中缺乏现成的民主模式和经验,结果导致妇女非政府组织结构松散,有明确组织结构和决策实体的非政府组织与结构松散的组织并存。很多组织都是临时组建的,任务完成即解散,其成员有的同时参加几个组织及其活动,还有很多成员靠专业技术独立工作,缺乏与组织的密切联系。埃及新妇女研究中心的领导人阿依达·塞夫·艾·达瓦拉(Ayida Saif Al-Dawla)同时是几个组织或党派的成员,它包括新妇女研究中心、健康与环境发展协会(AHED),以及纳赛尔党派与全国民主党(NDP)等。她同时还与埃及妇女作家协会有关联。20世纪90年代初期,为了准备和迎接1994年的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国际会议和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埃及非政府组织经历了短暂的发展时期,成立了“人口与发展委员会”(NCPD)、“妇女媒体观察”等组织。

(三) 埃及妇女非政府组织的阶级性

受埃及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经济结构转移政策的影响,埃及妇女的经济地位具有很大差异性,并无形中形成了不同的阶级分层、城乡差别,及相应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参与机会的不均等,因此,在妇女解放问题上不能忽视埃及妇女的异质性。埃及妇女非政府组织的形成及活动也受这一因素影响,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埃及妇女非政府组织最初是建立在“慈善”基础上,因此,其成员主要是中上层女性,这一最初的发展方向在以后的发展中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下层女性基本被排除在妇女非政府组织之外。此外,埃及女性主义者不同于左翼分子和伊斯兰运动成员,她们最初都不想动员大众,而是致力于加强团结和彼此间的友好关系,这也是造成埃及妇女非政府组织主要集中于中上层妇女的重要原因。例如,“埃及女性主义联合会”的成员最初多是会讲法语和倾向于西方文化的中上层女性,后来加入的成

员多是讲阿拉伯语的中层女性;^①“尼罗河女儿联合会”的群众基础是新兴的中产阶级女性;“阿拉伯妇女联盟”的成员主要是职业的上层和中上层妇女。^②不同的阶级会有不同的利益需求、思维方式,因此,不同阶层妇女难以达成统一行动。对于贫穷阶层的妇女来说,她们首先考虑的是改善贫穷状况,以及社会经济和文化参与机会,然后才会想到提高权利意识和社会角色意识。对于上层妇女来说,争取更多的参政和决策机会,进而融入社会发展的主流才是她们的首要奋斗目标。^③从理论上讲,女性主义思潮和运动代表全体女性的利益和需求,但受现实的阶级局限性影响,女性主义很难发展成全体妇女运动。

影响妇女非政府组织 形成和发展的因素

(一) 性别歧视

埃及是第一个承认《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阿拉伯国家,埃及宪法规定两性平等,但在现实中,各种形式的性别歧视依然存在。妇女在婚姻、工作等方面遭受不公正待遇,某些法律仍是男女不平等的主要来源,比如“私人身份法”(PSL)是建立在对伊斯兰教的保守解释基础上的,限制女性在公共场合的活动。埃及的“私人身份法”自从1920年生效以来,1925年、1979年和1985年曾多次修改过,但都是妥协的结果。它对待妇女问题仍是早期男性改革者(如卡塞姆·阿明)的思维方式。他们希望妇女走进公共领域,接受教育,参加工作,参与某些政治活动(如选举),但不重视妇女在家庭内的权利。^④从纳赛尔到穆巴拉克执政的几十年间,埃及的法律及政策在适时地变化,但与非政府组织相关的一些法规却始终没有变。埃及著名的“法律第三十二条”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虽然多次遭到女性主义者、人权组织及其他非政府组织和志愿性团体乃至国际社会的反对,

① See Bahira Sherif - Frash, op. cit., p. 90.

② See Nadjé Al - Ali, op. cit., p. 153.

③ See Dawn Chatty and Annika Rabo, op. cit., p. 168.

④ See Nadjé Al - Ali, op. cit., p. 76.

历届政府却仍把它保留下来,因为这项法律给予政府很大的控制权。1998年,埃及政府曾修改该条款,但修改法草案指出,为了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控制,要弥补1964年“法律第三十二条”的漏洞,扩大法律控制范围,^①非政府组织一直拒不接受这一修改法案。1999年5月,埃及政府通过了一项比前一年的非政府法草案更不民主和更具约束性的法律。^②2000年,埃及最高法院推翻了1999年的修改法,规定:除了已在社会事务部成功注册的组织以外,其他所有诉讼组织只能留有市民公司身份。^③非政府组织成员认为,政府修改1999年法律,是要剥夺他们在社会事务部以外运作的自由。^④

(二) 传统文化中的不利因素

传统文化是影响埃及社会男女地位的重要方面。伊斯兰极端组织对妇女问题持保守态度,提倡性别隔离,反对妇女走出家门,限制了妇女的社会参与机会。不仅如此,在宗教保守势力的压迫下,政府对妇女平等政策摇摆不定。1979年,埃及政府通过私人身份法修改案,在结婚、离婚、多妻制和孩子监护权等方面给予妇女更多的法律权利,这引起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及其支持者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埃及政府被迫于1985年撤销法令。尽管埃及政府赞成妇女平等,但顾及保守的伊斯兰势力而没有废除歧视法。处于政府控制下的媒体在性别问题上也持矛盾态度。媒体中的妇女形象非常保守,妇女的公认角色是妻子和母亲,工作的妇女被看做失败者。^⑤媒体是传播信息的桥梁,媒体对妇女问题的态度严重地影响妇女的自我定位。

(三) 政治经济因素

经济条件和经济政策也影响埃及妇女非政府组织的形成。萨达特体制虽然不反对男女平等,但新的经济政策并不鼓励妇女参与发展。萨达特的经济开放政策在造就一批富裕阶层的同时,致使全国失业率高涨,1986年男子失业率为10%,妇女为25%,^⑥但国家解决失业问题的政策却与统计数字不符,决策者把失业视为年轻有文化男性的问题,解决办法通常是以牺牲妇女就业为代价,比如给妇女提供半天半薪的工作或早退。^⑦国家放弃对毕业生的就业保护,撤销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服务,这对妇女、儿童和穷人等弱势群

体影响最大。20世纪80年代,埃及贫困人口进一步增多,城市家庭的51.1%,农村家庭的47.2%生活在贫困线以下。^⑧1991年以后,埃及政府实行“经济改革和结构转移计划”(ER-SAP),取消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和经济保障,使埃及下层人民的生活更趋艰难。贫困对妇女产生了更深层的影响,持续贫困剥夺了妇女的社会和经济机会,加重了她们的谋生义务。像医疗和教育这样的资源越少,妇女得到的机会就越少,因为妇女在社会中处于基本不利的地位,当在男孩与女孩之中必须择一接受教育时,女孩往往是牺牲者。因此,出现了“贫穷女性化”的趋势。经济环境的恶化使妇女没有时间和精力参与有关生存以外的活动,教育水平、组织能力和参政意识等一系列不良后果便相继而生。有些女性主义者对经济条件有更深层的理解。新妇女研究中心的领导者阿依达·塞夫·艾·达瓦拉在预测妇女发展前景时认为,贫穷是埃及妇女面临的最大挑战。^⑨

另外,官方对“经济活动”的定义也影响到妇女价值的实现。1986年,大多数埃及妇女的工作(农业和家庭企业中的无薪劳动、家庭劳动和非正式部门中妇女的经济活动)都不被视为经济活动,^⑩不把妇女活动算做经济活动对妇女产生消极影响。如果不承认妇女是工人,那么她们就没有受培训的机会,也就不具备参与发展所需的技能。^⑪

(责任编辑:安春英 责任校对:樊小红)

① See Nadie Al - Ali, op. cit. , p. 80.

② See ibid. , p. 67.

③ See Nicola Pratt, "Hegemony and Counter - hegemony in Egypt: Advocacy NGOs,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in Sarah Ben Nefissa and Sari Hanafi,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Situating Arab NGOs*,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00, p. 130.

④ See ibid. , p. 132.

⑤ See Dawn Chatty and Annika Rabo, op. cit. , p. 158.

⑥ Ibid. , p. 149.

⑦ See ibid. , p. 152.

⑧ Ibid. , p. 149.

⑨ See Azza M. Karam, *Women*, op. cit. , p. 127.

⑩ 1988年后,经济活动的定义更加广泛,妇女的一些无薪劳动也包括在内。

⑪ See Dawn Chatty and Annika Rabo, op. cit. , p. 152.